

《论语》教育伦理思想新探 ——学生伦理分析

陈旭清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论语》中丰富的教育思想为大家所熟知,已有许多论著作过阐述,遗憾的是,其中的学生教育伦理思想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探讨《论语》中学生伦理思想的基础、内容以及学生教育伦理思想的养成等问题,对我们当前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孔子;《论语》;教育伦理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13X(2006)05-0031-06

教育思想作为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有极大的包容性,其中的教育伦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人们在研究他的教育伦理思想时,往往只关注教师的方面,而忽视了在教育教学中的另一方面:学生的伦理。事实上,孔子关于教育实践当中学生的伦理思想也是非常丰富的。认识和探讨孔子在这方面的思想贡献,对我们当前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是有重要启示作用的。

一、孔子教育伦理思想的基础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社会大变动时期。随着铁农具的使用,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形成;与经济的变化相适应的是,传统的宗法制度遭到破坏,“君臣无常位”的观念开始出现;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对传统的天命观产生了动摇,对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的子弑父、臣弑君、妻弑夫的现象时有发生。正确地处理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已经是伦理学的一个重大课题。孔子伦理学说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这种社会需求。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为政以德”的思想,倡导实行“德政”,以

实现“安”的理想社会,提出了“举贤才”的政治主张。“贤才”从何而来?孔子认为从教育方面入手,由教育来培养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于是,培养“贤才”就自然成了孔子的教育目标。对于所要培养的“贤才”,孔子曾从多方面给予说明,诸如“君子”、“圣人”、“仁者”、“士”、“贤者”、“志士”等。统而观之,培养“君子”就是孔子教育的首要目标。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1];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可见,他所培养的是集“仁、智、勇、道、艺、德”等于一身的人,孔子的教育伦理思想也就由此而出。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他伦理思想的核心所在。孔子关于“仁”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他重视人的作用,注重人的内心修养;另一方面,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人民安居,社会安宁,国家稳定。孔子把“仁”当作最高的道德原则,而“仁”的范围又是非常广泛的,它包括诸如爱人、忠、孝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的每一种品德只反映了“仁”的一个方面,只有这些众多的品德集合起来,才能构成他所称得上的“仁”。

* 收稿日期:2006-03-14

作者简介:陈旭清(1969-),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和中国近现代史。

“爱人”则是“仁”的主要内容。孔子希望通过“仁”的教育,有助于缓和人與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希冀出现“三代(夏、商、周)”时那种亲亲相爱的社会局面。

仁者“爱人”的思想,源于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为人是可以教育的,人天生具有善的品德。他的这种思想,已经超出了原来血缘宗族的亲亲关系。在我国奴隶宗族社会里,族类的亲疏远近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准。孔子的这种摆脱血缘关系的仁爱精神,无疑对传统的宗族观念是一种极大的冲击,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型阶层人们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要求统治者施仁政的思想,要求统治者爱民、养民、富民、教民、安民、博施于民。冉有和孔子谈论“庶”、“富”、“教”三者关系时,孔子提出了富而后教的思想,他认为教育是达到理想社会的最佳途径。

当然,孔子并不是主张无原则的爱人,他在谈到对“仁”进行判断的标准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为人者能好人,能爱人。”《里仁》)又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里仁》)就是说爱仁人是仁,恶不仁者也是仁;做为“仁”者,就得既爱“好仁者”,也得恶“不仁者”。在讲到关于“仁”的评判标准时,孔子还提出了一些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思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顺应历史形势的发展来认识“仁”。孔子在对管子评价时,就是以此作为标准的。尽管管子背弃了他的主人,帮助齐桓公杀了他的哥哥,举行了诸侯会盟,但由于这种举动顺应了历史潮流,所以孔子把他的活动称作“仁”。

在谈到“仁”的形成时,孔子首先承认“仁”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恒至矣。”《述而》)认为只要努力,就可以实现“仁”的境界,让人们感到“仁”的境界并不是高不可攀。当有人问什么是“仁”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即克制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要求就是达到了“仁”;同时,他又指出在“仁”的实现过程中,必须按照礼的要求来办事,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认为这是实现“仁”最基本的要求。在德性修养上,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样才可“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这在言语上表现为“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即仁人说话常常是谨慎的。他又说仁人的人是不需要用花言巧语为自己辩解的,“雍也,仁而不佞”《公冶长》),冉雍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仁”人,他认为只会言词表现的人“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仁”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也即有仁

德的人对艰难的事情抢在别人前面去做,对能获奖的事情便倒退在别人后面,这样的人才可称的上有仁德。孔子认为达到仁的境界时应该具有某些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子路》),但这还不是仁;当子张向孔子问怎样才能是仁时,孔子说能够在天下做到“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才可“为仁矣”《阳货》)。但是,仅有这些品德还不能称得上真正的“仁”,他强调“仁”的实现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需要实践者持之以恒,只有长时间坚持“仁”的品德时,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仁”。他认为颜回之所以做到了仁,是因为“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

“仁”从哪里来?人们应该从哪里学习“仁”?孔子指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就是要广泛地学习且能坚持自己的志向,恳切地提出问题,联系当前情况进行思考,仁就包含在这里面。这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说明“仁”的含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社会环境的发展而变化;“仁”的本质是社会实践的丰富内容,而不是拘泥于空洞的理论教条。这体现了孔子顺应时代的进步思想。

“礼”在孔子的思想中占着重要的地位。首先,他把礼看作是立国和立身的基础。“为政先礼,礼者,正之本与”;“不知礼,无以立”《尧曰》);“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在论语中,孔子七十多次提到礼,可见他对“礼”的重视。在关于礼的认识上,孔子认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因革”和“损益”,后代的礼不同于前代的礼,“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即是说殷于夏,周于殷的礼制有因(继承)的一面,也有益(变革)的一面,即所说的“损益”。而这种损益并不是数量上的增减,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变化,要随时代的变化注入新的内容。其次,孔子把“仁”做为“礼”的内容,反对把“礼”当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在孔子的伦理学中,“仁”和“礼”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认为“礼”是实现“仁”的载体;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还强调“仁”是先于“礼”而存在的,“仁”的地位要高于礼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既表明“仁”存在于礼乐之中,又表明仁是高于礼乐的。孔子主张把“中庸”做为“礼治”的标准,视“中庸”为“至德”,即礼的最高标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

在孔子“礼”的内容中,包括礼制、礼仪、礼则诸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论语中有许多和“礼”有关的范畴:“分”、“恭”、“敬”、“让”等,其核心是“正名”,孔子把“名分”视为“礼”的最重要内容,“非礼,无以辩君臣、上下、长

幼之位也”《礼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子路》)。在谈到礼的行为时,孔子认为“礼”即是学习。他在进周公庙时,件件事都要问,并说这就是“礼”。同时,他也说能指出别人错误的行为也是属于礼,在陈司败指出他的错误时,他感到非常的幸运,认为这就是礼的行为。而对那些不符常规的越位行为,孔子视之为非礼,由于管仲的家庭布设与国君相似,他就说管仲是不知礼的。同时,孔子也强调仅有形式上的礼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内心深处得到表现,把情感上的敬意当作“礼”的重要表征。“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八佾》),认为这些行为都是不符合礼的。

孔子非常注重“礼”与其他品德的关系和作用,指明无礼的危害,“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蒺,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说明礼对它们的重要辅助作用,没有礼的配合,人的行为会受到损害。“礼制用,和为贵”(《学而》),即是说“礼”的应用贵在处理任何事情时都能做到恰到好处。在日常生活中,对别人尊重恭敬,符合了礼,才有可能免受耻辱,“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学而》)。凡此种种,都表明“礼”在节制人们的性情、使言行恰到好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二、孔子学生伦理思想的内容

孔子重视人伦道德在学习生活当中所起的作用,并把道德操守提到做人的高度来认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强调坚守道德原则是做人的根本。在此基础上,孔子从学生与老师、学生与父母、学生与朋友、学生与社会等方面论述了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应该具备的伦理道德品格。

与前人不同,孔子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认为学无常师,任何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取舍,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当魏国的公孙朝问子贡孔子的学问是从哪儿来的时,子贡回答:“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都是向人们说明人无常师的道理。这是孔子尊师思想的基础,是他“仁”的思想在教育上的具体化。“爱人”就是要不局限在亲亲的范围内,就是不把族类的亲疏远近作为是否受到尊敬的标准,这种思想不但是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反叛,也扩大了学生求学的范围与渠道。在认定别人可以作为我们老师的基础上,孔子提出求学的具体方式:第一,要虚心请教。“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凭自己的温和、善良、恭敬、

节制和谦逊的态度来得到别人给予的知识和信息,说这是他不同于别人的求学方式。第二,要仰慕老师的言行和品德。“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把老师的为人当作自己心灵的偶像,仰之弥高,视若日月,唯恐不及。然而,仅仰慕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先进》),这样才可以达到自己所追求的境界。可以说,孔子在师生关系上,从学生来讲对老师的尊重,集中表现为仰慕自己的老师。第三,能够把老师所讲的思想内容进行阐发光大,这是对老师最大的尊敬。颜回是孔子非常赏识的学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颜回能将他所讲的内容进行发挥,孔子说颜回“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对他进行表扬。第四,孔子强调学生应该关心老师,当他在匡地被围时,颜回最后才赶来,孔子生气地说:“吾以女为死矣”(《先进》),怪怨他对老师关心不够。同时,孔子对学生的欺骗行为也是深恶痛绝的,在他病重时,子路安排学生充作家臣为他准备后事(孔子实际没有家臣),孔子病愈后愤怒地指责了子路的这种欺骗行为,怒言:“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当然,孔子倡导尊师并不是要学生一味的盲从老师,他说:“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在谈论问题的时候学生也要坚持自己的正确看法,不必因尊师观念而放弃己见。孔子的这一思想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一方面表明原有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新的社会形态需要敢于创新的人才,借助这些人的开拓精神将社会不断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也表明孔子思想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即重视人的个体价值,关注学生个性的形成和塑造,而个性的形成与培养正是教育伦理学的核心所在。可惜的是,他的这一宝贵思想多少年来一直被人们误解。孔子提倡师生平等,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认为学生也应该对老师有所帮助,他虽然称赞颜回,但又说“回也,非助我者也”,流露出因颜回对自己没有帮助的不满,其中就暗含了教学相长的思想。

“孝”是孔子处理学生和家伦理关系的核心指导思想。他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把“孝弟”当作“仁”的核心所在;他认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学而》),把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道德品行放在学业的首位,在此基础上,才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孔子看来,“亲亲”之爱是爱人的起点和原动力,爱人的感情要在“爱亲”的基础上培养,并由此而扩大,冲破血缘关系的束缚,达到普遍的“仁”爱。

孔子认为,孝敬父母兄长要真心实意,要带着感情去

做自己份内的事,认为使长者在精神上感到敬重要胜过简单的对他们的衣食给养。“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强调只有衣食之足是一般动物也能做到的。故而,当父母亲还在世时,他要求晚辈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学而》);“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为政》);“父母唯其疾之忧(做父母的只是为子女的疾病担忧)”(《为政》);“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里仁》)。当然,孔子也不是要求子女唯父母意志是从,他认为当父母有不对的地方时,子女是可以通过委婉的语气加以劝阻的。

在孔子看来,子女对父母的孝心,首先要表现为不违礼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当父母不在世时,首先要慎重地对待父母的丧礼,祭祀祖先要敬重、真诚,“慎终,追远”(《学而》)。怀念和敬重死去的父母,是子女孝和“仁”的感情延续。孔子认为,孝的情感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它并不随着丧葬礼节的完成而结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即是要坚持父亲的遗志,不逾父辈对自己的期望。孔子以小孩生下三年才离开父母怀抱,来说明守孝三年的必要性,“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阳货》)。以父母生养自己的时间和守孝的时间相对等,充分体现了孔子对恩德仁义的重视,从中进一步贯穿了他的仁爱思想。

同学之间的团结协作既是学习进步的一个有利条件,也是学生个体走向社会的基础。孔子从培养君子的愿望出发,用拟亲的语气(将朋友拟做兄弟),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处理同学朋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和方法。他认为个人品德的有无是能否交友的前提,“德不孤,必有邻”(《里仁》),只要自身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就一定有人会和你交朋友。在日常的生活中,并不是在社会上没有自己的朋友,而是与自身有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只要自己做事认真,对待别人能恭敬有礼,朋友弟兄有的是。

当然,在结交朋友的时候,孔子并不是一概而论,而是讲究一定原则的,“道不同,不足与谋”。他将朋友分成三种类型:“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者;“可与适道,未可与立”者;“可与立,未可与权”者(《子罕》)。实际生活中要找和自己有共同志趣的人交朋友,“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里仁》),反对和没有仁义道德的人做朋友。他认为朋友之间的相处,坚持诚信原则是最重要的,“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学而》),若是做不到这一点,就“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认为诚信之于

个体就如^轴枢(车的關鍵部位)之于车辆。他还提出所结交的朋友应该是“毋友不如己者”,不和道德品质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对于结交朋友的方式,孔子主张“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凭文章和学问结交的朋友会对自己的仁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这样就提高了朋友交往的层次。同时,他也指出朋友之间的相处是不同于兄弟关系的,朋友“切切^{悱悱},兄弟怡怡”(《子路》),即朋友之间是以相互的批评而又和睦相处的关系,这从另一侧面论证了他关于“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子路》)的判断。当然,他认为朋友之间的批评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朋友数,斯疏矣”(《里仁》)。过分的不合时宜的批评与规劝可能会把事情搞得适得其反,导致朋友感情的伤害,这在今天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与朋友相处时,孔子主张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吾攻人之恶”(《颜渊》),对他人的错误和缺点采取宽容的态度,可以避免人们之间不必要的矛盾冲突,从而有利于朋友相处。

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目标,孔子对受教育者与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是非常关注的。他认为学生要选择一个好的生活和居住环境,“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即要选择行仁道的地方居住,若是相反,则不能说明自己是聪明的。他认识到了环境对个体成长所起的作用。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受教育者是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有些环境对受教育者又是非常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不要过分的埋怨环境,要加强自身修养,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不患莫知己,求为可知也”(《里仁》),当别人不理解自己时,要努力谋求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才干。对于环境好坏的判断,也不能只根据个人的主观好恶来决定,他认为依照个人的利害关系行事就会导致许多对自己不利的结果,“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环境对学习和生活的影响很大,但它不是制约学习的根本因素。在这点上,孔子对颜回的吃苦耐劳精神大加赞赏:“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表扬颜回的吃苦耐劳精神。

孔子持积极的人生态度,提出学生不仅要适应环境,更要改变环境。为此,他主张首先以环境为师,从环境中学习,学生应该“多问,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学习社会中那些优秀的、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有积极作用的东西,并把这些知识视为仅次于先天得来的知识(孔子认为先天带来的知识是层次最高

的知识)。把整个社会大环境作为自己的学习课堂和内容,从根本上冲击着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观念。为了改变环境,孔子要求学生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1. 进行游说。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向社会传播出去,希冀被一些开明的君主接受和采纳,然后在实践中贯彻,最终实现类似三代的大同社会。孔子的一生几乎就是这样度过的。

2. 适时而动,参与社会实践。当社会不太圣明时,孔子主张避世,不参与社会管理,只进行自己学说的传播,“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宪问》);当社会走向圣明时,要积极地走出来参与社会事务,做他应该做的事。“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学生通过学习成为贤者,然后参与政治,是孔子的一贯主张。他反对对社会进行激烈的变革,尤其反对以下犯上的社会改革,认为那是不合乎礼仪的。

在学生与社会的伦理思想中,孔子注意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尽管对这句话历代的注解相差甚大(《诸子集成》)^[3],但是,其不主张斩尽杀绝的伦理思想是人所共识的。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和挖掘这一闪光点,不仅是教育伦理的需要,也是社会生态的需要。教育在关注自身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自身赖以存在的自然界。

三、孔子学生伦理的形成方法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教育伦理思想,既有完整的基本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也有一套比较系统的道德修养和形成方法。并且,他对这种修养和形成方法是非常重视的,当子贡问他怎样实行仁道时,他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卫灵公》)强调了道德修养方法的重要性。兹将这些方法分述如下:

(一)笃信好学,死守善道

孔子认为,在道德形成的过程中,必须重视道德知识的学习,“知者不惑”(《宪问》),“知者乐”(《雍也》)。因为只有理解和掌握了一定的道德知识,才可以使自己明辨是非,分清利害得失,不为不良现象所迷惑,从而决定自己的行为取舍,这种内心的充实会使自己心情愉快舒畅。反之,不重视道德知识的学习,则会使自己遭受和养成一些不良的行为品德,“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由于缺乏应有的知识,尽管自己主观上爱好仁德,但也不免产生各种流弊,这对自己的道德养成是非

常不利的。只有既爱好仁德,又喜欢学习的人,才可以具有完善的道德修养。

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也是孔子学习和形成道德品德的一种方法。“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种择善而学的学习方法,不仅对道德,就是对其他学习也是非常有益的。

在学生道德形成的过程中,孔子强调意志情感的重要作用,认为道德知识须辅以意志情感才可塑造出良好的道德品质。他十分重视意志在人生当中的作用,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同时,他还认为意志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如何培养学生的意志,孔子要求学生做到“学道”和“守道”。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至于如何学道,他认为“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和那些仁人贤士相交好,这样做可达到“利器善事”的功效。至于守道,孔子教育学生要相信自己所坚守的道是正确的,“守死善道”(《泰伯》),永不放弃。他相信一个人要是真正的守道,就可以经受一切考验,能够清醒地决定自己行为的取舍。孔子反对那种说自己能力不足、半途而废的道德修养,认为那只是找的借口而已,根本不是能力所不及。当然,孔子承认,意志的养成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希望学生要有耐心,做到持之以恒。

(二)由近及远,笃实躬行

在如何培养学生的伦理道德方法上,孔子主张从学生的身边事做起,从小事做起,从日常行为入手,由小及大,由近及远。他说:“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已。”(《雍也》)能由自己推及到别人,可谓是一种好的道德修养方法。道德修养也是一个习得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孔子这种推己及人的方法,蕴含着爱己爱人的仁爱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他仁爱思想的平等性。

孔子认为,道德修养最终应该体现在行动上,把个体的实际行动作为检验其道德修养的成功与否根本标准。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并说这是他看了宰予的言行不一后才改变的。为此,孔子极端讨厌那些只是花言巧语,而不把道德付诸于行动的人。“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宪问》)。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认为那些有道德修养的人,总是言语谨慎,唯恐自己的行为跟不上。“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为政》),应该少说多做;或者“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先做后说。为了不让学

一的不良习惯,孔子注重教育学生并身体力行,要求他们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子路》)。若是当时做不到,就不要先说出来,“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由此,孔子深恶痛绝那些言行不一、不懂装懂的人,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认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是君子应有的品质。

(三)注重自省,改过为贵

孔子承认,人是会犯错误的,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有时也会有一些错误的思想意识萌发。为此,必须经常进行自我反省,从言、行、德等多方面和别人对照,要及时发现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过而不改,是谓过也”(《卫灵公》)。

对自己的言行严格要求,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不把错误隐藏起来,这是孔子提倡的一种非常有效的道德养成方法。强调自我反省的道德修养方法,实际上是承认人的能动性的表现,认识到了受教育者是道德修养成功与否的关键,这与他的教育思想——培养和形成人完美的人格是一致的。

(四)他人的表扬与批评

孔子认为,在受教育者的道德形成过程中,教师、家长等人也起着重要作用。在教育实践中,孔子多次对学生的优点进行表扬,注意鼓励学生坚持正义,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发展与进步。在表扬的方法上,孔子不计学生进

步大小,只要是优点就及时表扬,要求教育者善于从学生身上发现闪光之处,并给予及时的赞扬与鼓励,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同时,让学生看到希望,鼓励学生“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另一方面,孔子也重视榜样的作用。表扬的对象,也就是他树立的榜样,他希望通过榜样来克服其他人身上的不足与缺点,“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用品德好的人做榜样,其他人就会跟着向好的方面转化。

在用表扬方法的同时,孔子也重视批评的技巧与作用,认为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孔子的批评,立足于他的仁爱思想,运用时讲求严,同时注意批评的场合和具体对象,因人制宜,掌握批评语气和态度的轻重缓急。例如,颜渊比较敦厚,孔子在批评时就较为温和;子贡较为张扬,孔子批评时就措词较为严厉。运用批评方法时,孔子认为应该指出学生所犯错误的原因和危害,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并及时改正错误。在具体方法上,孔子也是因人因地因时而用,他用过的方法有恳责、提问、说理、示意等。

总之,孔子是非常关注教育活动中学生教育伦理层面的,并且还形成了自己较为完整的伦理教育思想,无疑,这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是有借鉴意义的。当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其中的某些内容已经过时了,对之我们要进行积极扬弃,这是我们对待古文化的一贯态度。

参考文献:

[1] 论语.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2] 诸子集成.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A new perspective of the ethic education in *Analects*

CHEN Xu-q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

Abstract: While most of the educational ideas except the ethics of *Analects* have been accounted, the writer of this paper basically discusse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ual foundation, contents, and formation of the ethic education in the *Analects*.

Key words: Confucius; *Analects*; ethic education

[责任编辑 范玉凤]